

王梦奎：

国务院智库的第一小提琴手

王梦奎，经济学家。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任研究员、经济组副组长。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专职委员、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199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9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95年5月至1998年3月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研究，参加过党和国家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他同时还是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 温县的穷“秀才”

王梦奎1938年4月13日出生在河南温县的一个叫安乐寨的贫苦人家，那是古三国时司马懿的故乡。在王梦奎儿时的记忆

里，他的故乡安乐寨并不安乐，有的只是战乱、灾荒、疾病和饥饿，王梦奎的家境非常不好，常是有了上顿无下顿他 5 岁时，家乡闹蝗灾，地里颗粒无收，全家人只好靠树皮草根充饥，村里很多人饿死了，王梦奎算是苟且活下来。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了，王梦奎开始上小学，尽管家境穷困，但他却天资聪慧，是安乐寨有名的小秀才。由于他从小随母亲到外婆家住，使他很小就接触到具有很深文化素养的堂外祖父堂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乡贤，喜欢读书、作诗、写春联，一条街的春联大多出自他之手。王梦奎对堂外祖父很是敬重。堂外祖父写春联时，他总是在旁边做下手：研墨和铺纸慢慢耳濡目染，日有长进。

王梦奎小学五年级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有一次堂外祖父自言自语，写出上联“松竹梅岁寒三友”后却想不出下联来。王梦奎说：我可以对下联。堂外祖父盯着王梦奎良久后摇摇头，有些不相信他能对出。可是王梦奎已脱口而出“中苏朝永久一心”。老人一听对得如此工整，激动地把他拥在怀里，连连夸赞。

王梦奎受堂外祖父的影响，读书兴趣越来越浓，但那时乡下读书可不容易，他只好见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堂外祖父家的书读完了，他就到庙会上的书摊上读。后来有一个机会使他接触更多的书籍。那是一个偶然的机，校长指定王梦奎管理学校的小图书馆，那里书虽不丰，但足够满足一个小学生的求知欲，使王梦奎这个生长于穷乡僻壤的孩子开阔了眼界。当时，他真正幻想将来成为一名作家，把自己的经历和看到的苦难和快乐写给世人看。他开始写诗歌和散文，在地方小报纸上发表。

1951 年底，王梦奎小学毕业了。因家境困难，父母亲都希望他报考一所银行学校，因为银行学校管饭吃，可以缓解家庭经

济拮据，毕业后还能有个铁饭碗，挣钱也不少。可是王梦奎却没有听从家长的旨意，一是他年纪太小，二是他当时真不知银行到底是干什么的。于是当他前往报考时，半途又返回了。

1952年，14岁的王梦奎考入了邻县的沁阳师范初中部。当时附近几个县只有沁阳师范寒假招生，而且只招一个初中班，由于考生多，录取少，因此当王梦奎得知自己被录取后格外开心。

学校生活是艰苦的，尽管当时已经进行土地改革，可是农村经济仍然非常困难。王梦奎跟班上的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吃没好吃的，穿没好穿的。有一次母亲为了给他准备书费，到多家借钱，结果才借到两块钱。王梦奎班上的同学来自邻近各个县，有的步行百余里，背着铺盖卷来到学校。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大家学习上勤奋生活上彼此照顾，颇有革命一家亲的情谊。

王梦奎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当时他在沁阳初中的生活：“……穿的都是家里缝制的布鞋和衣服，有的还打着补丁。洗脸用的是当地出产的小瓦盆。睡通铺，一间房子钉两排木板，睡二十多人。伙食也差。吃的是玉米面粥、汤面条和窝头、咸菜，还经常吃不饱。同学们没少给司务长老卫提意见。也难怪他，一个月伙食费只有不到七元钱。为了办好伙食，他尽了很大努力，还想了一些新鲜名词儿。在玉米面粥里掺入几粒大米，美其名曰‘金钱粥’。当时沁阳师范在城中鲁斋庙旧址，一条大路，一条河沟，把校园划作三块：教室在路北，宿舍在路南，宿舍之南是河沟，河沟之南是操场和饭场。所谓饭场，是一排不能避风却可躲雨的棚子。每餐由值日生打菜，七八个人围着菜盆蹲着吃，河南人谓之圪蹴。河南人从小练就的这种‘蹲功’，在全国是很少见的。没有柏油路，每逢雨天，踏着很深的泥泞去吃饭，鞋袜湿了没有干的换很难受。不少同学用二寸余厚的木板做成“泥札”，绑在脚板上行走。我是到1954年才买了雨鞋的。”

学校设施很差。教室破旧，二年级以后才盖了几座新教室。操场也是后来修的。同学们用很多时间参加为盖房清理场地和修操场的劳动。废址破砖碎瓦数量大，埋藏深，清理颇为费力的活很重，但大家干得都很起劲儿，因为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校园一天天地美好起来。”

尽管生活如此艰苦，可学习却是紧张刻苦又愉快，大家都知道父母供自己读书之艰难，便格外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课堂上同学们分秒必争，晚自习每个教室都鸦雀无声

王梦奎是这群穷学生中成绩最为拔尖的，尤其他的作文水平令他的任课老师惊叹。他们班的板报经常由他主办，他在板报上的文章、打油诗常常受到学校的表扬，王梦奎在学校里也有了“秀才”的雅号。

王梦奎这个“秀才”在学校里很活跃，后来还成为师范的一名文艺骨干。有一次，师范班的同学演出过大型话剧《保尔·柯察金》，他很受感动，便组织班上的同学排练文艺节目，他曾在怀庆梆子《游龟山》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过了一次舞台瘾。

1955年，王梦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沁阳一中。

## 永远的北大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已离开母校整整四十年的经济学家王梦奎徜徉于碧波荡漾的未名湖畔，眼望湖光塔影和日新月异

——

“北大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 20 岁入北大，时值北大建校 60 周年。今年北大举行 100 周年校庆，我已经 60 岁了。人生是短暂的，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60 岁已经开始步入老年。但是，对于一所大学来说，100 岁还是青年时期。北大的前途正未限量，北大的前途取决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也有赖于每一个北大人的努力。在北大五年的学习，对我几十年来的工作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势必还会影响我的余生。可以说，没有北大，就没有我今天，也没有我的昨天和明天。”

王梦奎在中学时喜欢文学和历史。曾幻想成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但是在五十年代中期经济建设高潮的感召下，他认为经济学可以经济世，学习经济学或许可以为国家多做些事。于是报考北大经济系，当时他 20 岁。

王梦奎在北大学习了五年，当时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反右运动、大跃进，全国风风雨雨不断。当然学校也不是世外桃源，书生气十足的王梦奎，也被卷进了一场场的运动之中，其心灵所造成的伤害总是一言难尽。王梦奎说，“快乐是短暂的，悲伤是长久的，但回首往事，不愉快的事早已烟消云散，北大留在我心灵深处的，是美好的回忆和永不磨灭的怀念。”

北大对王梦奎最大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专业知识的把握和治学方法的训练。北大的专业知识教育是扎实的。当时陈岱孙、罗志如、樊弘、赵靖等有名的教授，都给学生开课，甚至给低年级学生开课。赵靖开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课，是全国高校的首倡。罗志如、樊弘、范家骥等开的西方经济学课，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厉以宁当时只有三十岁左右，他讲授外国经济史条分缕析，深入浅出，深受同学欢迎。老师们的渊博知识就是榜样。图书馆是开放的，丰富的藏书有很大的吸引力，可以借阅包括解放前出版的图书、报刊和杂志。经常

举办学生自由参加的各种讲座。王梦奎没有浪费这几年的宝贵光阴。六十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因病休学大半年时间，在校学习的五年没有回过家，所有的寒假、暑假乃至星期天，都是留在学校读书的。他除读经济学，还漫无计划地读了不少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书籍，因此有人便称他是一个以经济学为主的杂家。

当时王梦奎对中国经济思想史产生了兴趣，学年论文题目写的是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毕业论文写的是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因此他研究了一些关于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方面的资料。指导老师赵靖教他怎样做卡片，怎样拟论文大纲，以及文章的起、承、转、合，使他受益匪浅。王梦奎感觉到，所有授课的老师，在教学中都是毫无保留的，总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多学点东西。也许是巧合，甚至是幸运，他从北大毕业后一直从事笔墨生涯。先是做编辑工作，后来长期在国家机关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参与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业余自己写些东西，成绩斐然。在北大所受的教育，使他享用终身。

二是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培养科学和民主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北大的光荣传统北大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独树一帜，起着拔新领异的开路先锋作用。在“大批判”愈演愈烈，个人迷信之风日炽的年代，这种精神是受到严重压抑和摧残的但在北大，它从未泯灭。当时，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在北大也是受到批判的，但细心的人都会感受到它的潜流。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可以读到很多可以反映世界学术动态的图书和资料。老师在课堂讲授和课下辅导时介绍不同学派的观点，虽然经常是小心翼翼地以“批判”的形式进行的。持不同见解甚至是不同学派的老师，相互之间彬彬有礼，友好相处。成名成家的思想是受到公开批判的，但不少老师私下还是鼓励学生立志成名成家。他至今记得樊弘教授的话：文从放屁始，诗从胡说来，青年

人要有勇气，大胆写，开始不要怕写不好。以王梦奎当时并不怎么高明的俄文水平，梦弘介绍他参加《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一书的翻译工作，经过翻译实践使外文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老师对学生提出的各种见解是容忍甚至鼓励的。张友仁先生讲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期终考试时王梦奎在答题中批评了他的一个观点，他不仅毫不计较，反而给他打了满分。王梦奎感慨地说，姑不论孰是孰非，光是这种气度，就永远值得他学习。这些年来，当王梦奎先后在几个研究单位担负领导职务的时候，在北大培养起来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对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使他能够兼听不同见解，采纳诸家之长，共同做好工作。

1964年，王梦奎经济系本科毕业，报考北大新设立的国际政治系研究生，考试分数名列前茅，被录取了。但是，由于上级领导机关急需像王梦奎这样的经济人才，王梦奎放弃了继续深造，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编辑部，从事经济、政治、理论的研究和编辑。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王梦奎的学术编辑工作被迫停止。他被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从此与北大的关系断了近10年，直到70年代末恢复与母校的联系。以后在许多学术活动场合，他经常碰到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他发现，由于在逆境中坚持读书和思考，虽然历经磨难，他们的学业没有荒废，思想更成熟了，有些人成为有影响的学者。王梦奎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并且因为著作方面的一点成绩而得附骥尾，成为北大出身的学者队伍中的一员，他为此而深感荣幸和自豪。

王梦奎对北大深怀感情，他的两个孩子都在他的影响下顺利考入北大，如今都已学成毕业。

1991年，王梦奎受聘兼任北大教授，1993年起任博士生导师，又成为了北大教师队伍中的一员。这些年来，他除了带几名

博士生外，还参加北大的一些学术活动，多次作过关于经济问题的学术报告。王梦奎说，他每进入北大校门，都有一种归家的感觉。每次在北大参加活动之后，总要在校园里走一走，湖光塔影，一草一木，都引起亲切的回忆，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他称北大是他永远的北大。

## 中央办公厅新来的研究员

1964年8月，王梦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在经济研究方面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便开始了1年动乱。

1969年5月，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一去就是6年。在那漫长而苦闷的日子里，他除了劳动、写思想汇报外，惟有书籍随他度过寂寞的岁月。他秘密或半秘密地阅读中外历史和哲学。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令他深思，也令他清醒，更令他忧心如焚。

1975年8月，王梦奎终于结束了漫长的“五七干校”生涯，回到北京，到第一机械工业部调查研究室工作，这才初步开始了比较有系统的经济研究，当年写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一书。这是王梦奎的第一部专著。他所讲的农业机械化，是泛指以机器大工业来改造农业，包括在农业中广泛应用现代化科学技术。他是想从农业的根本技术改造这个侧面，为实现现代化呐喊。

1979年，王梦奎被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工作，继续从事经济研究。翌年初，研究室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研究室。王梦奎任研究员、经济组副组长。他直面中国经济，对每个时期出现的经济现象都能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王梦奎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企业领导制度改革中提倡厂长（经理）负责制，但有很多人不同意，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针对这一情况，王梦奎几下基层，进行考察，然后继续理论研究和分析

王梦奎认为，职工群众当家作主、实行民主化管理，同一长制并不矛盾。工人阶级是作为一个阶级来进行管理的，至于采取委员会式的集体管理制，还是采取一长制，那是管理的形式问题，不涉及管理的阶级实质。他指出：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发展的历史来看，最初的企业规模不大，资本家个人经营，个人决策，他是资本家，同时也是企业的司令官；后来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发展了股份公司，产生了所谓经理阶层和董事会、理事会之类具有集体领导性质的管理机构，但这只是决策机构，日常的生产行政指挥，则是由厂长或经理全权负责的；社会主义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国民经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企业就如同这个有机体中的活的经济细胞，为了使这种社会化大生产能够顺利进行，统一指挥显得更为必要，大机器生产的技术条件，使生产过程具有不可间断的性质，要求成千上万的人动作准确无误，成百上千的生产环节密切协调配合，许多问题需要迅速决断。如果不是“一个指挥”，而是多头指挥，或者没有指挥，那就不能及时地解决生产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协调各个人的活动，生产过程就会

发生紊乱甚至陷于停顿。

王梦奎也同时指出，厂长要真正负起指挥生产的责任，必须精通业务，成为内行，否则就会成为瞎指挥，就像蹩脚的乐队指挥会使演奏成为音调杂乱的噪音一样。

王梦奎的诠释使人们更多地认识到“一长制”在社会主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股份制”八十年代中期在我国开始实行。关于这个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存在着疑虑。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从社会经济史考察，虽然它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很远，但其充分发展，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就是人们疑虑的症结所在。

整个改革开放的每一件事都会牵动着王梦奎的心，如何更好地诠释“股份制”这一问题，他食不甘味。1987年2月他撰写出《股份经济之我见》，发表自己的见解，逐渐驱散了人民心头的迷雾。他说：股份制是作为解决生产社会化和资金相对分散地为不同的所有者占有这种矛盾的一种形式而得到广泛发展的，如果撇开它的社会性质，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股份制的基本内容，便是集资；如果没有一定大规模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对于资金数量的比较大的需求，或者单个所有者拥有并且能够投入所需要的全部资金，便不会产生集资的客观要求，也便不会有股份制应该承认，股份制的产生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社会化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是不是说，股份制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采用这种组织形式，或者说，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已经失去其存在的根据了呢？他认为不能这样说。他说，既然社会主义现阶段还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既然在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之间，在地区和地区、部门和部门

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和利益上的差别；既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存在着聚集资金的客观需要；既然公有制还需要探索适当的实现形式，那么，股份制这种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就仍然有其存在的根据。

王梦奎阐述了股份制的优点，比如：构成其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既可分解，又能合并，可以舍去其具体的物质内容，比如劳动力、资金、生产资料或者生产和经营的其他物质条件，将其间的差别表现为纯粹量的差别；所有参与者的资金或者其他生产要素，都可以折为能够等分的股权，交由企业或联合体经营。这样做，简便易行，也有利于正确处理各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股份制在不同性质和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中，有着比较广泛的适用性，不失为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股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情况要复杂些，股份经济可以是多种性质的。王梦奎举例说，劳动者个人集资所办的股份制企业，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不同的合作经济单位集资所办的股份制企业，其性质仍然为合作经济；不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集资所办的股份制企业，其性质仍然为全民所有制，但其内涵也可以有所变化。他指出股份制既然只是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那么，单就这种组织形式本身，还不能说明它属于何种社会性质；既不能说股份制必定是资本主义性质，也不能说股份制必定是社会主义性质。究竟属于何种性质，要看它的具体内容。可见，如果实行股份制，虽然不能说必然引起所有制性质的变化，但将会使所有制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和不确定的形态，却是毫无疑义的。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对于作为生产关系的所有制的认识也需要深化。

王梦奎的文章发表后，一些大报作了转载，关于“股份制”

的讨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让更多的百姓理解“股份制”的意义，王梦奎还下基层发表演讲，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人们记住了王梦奎的名字可以说，股份制在中国的普遍实行与王梦奎做了大量的排疑解惑工作是分不开的。

## 中国经济改革的“发言人”

1987年9月，王梦奎调至国家计划委员会任专职委员、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继续从事经济研究。

这时，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虽然治理通货膨胀是我国建设和改革道路上无法回避或绕开的难关，但能否有力地治理，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不仅关系着国民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和社会能否安定，也关系着改革的成败。

面对通货膨胀的局面，王梦奎经过分析和研究，提出三条可供选择的道路：

一是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或火上烧油，企图以此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给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带来灾难性后果，是不可取的。

一是急刹车，实行极度的紧缩政策，在很短时间内消除通货膨胀这种办法过去曾经成功地使用过，但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一是逐步缓解通货膨胀，降低通货膨胀率，保持经济的适度

增长。看来，这是比较可行的路子。他认为，从目前通货膨胀的态势看，必须实行适度的紧缩政策，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能够成功地实施适度的紧缩政策，通货膨胀率能够逐年缩减，物价总水平也会有大幅度上升。可见，这条道路也并不是很容易走得好的。

后来中央采取适度的紧缩政策，逐步制止了通货膨胀的蔓延。

1990年5月23日，王梦奎率代表团参加亚太地区技术与经济研讨会，他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与会经济学家的兴趣。他告诉与会者，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不变的一项基本国策，自1979年以来，在对外开放方面，已经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步伐。不论国际上发生什么风波，我们都不会把已经打开的国门再关上，在当前经济调整乃至整个9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将努力保证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努力扩大出口，适当控制进口，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90年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将保持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势头。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困难，正如中国俗话说：每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中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不少困难，例如人口和就业的压力，建设资金的短缺，基础设施的不足，以及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所难免的社会震荡等等。但是，王梦奎坚信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目前存在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中国经济发展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他对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持乐观的态度。根据是：

——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现代化建设打下了比较雄厚的基础；

——中国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科学技术力量和熟练工人队伍；

——经济改革取得了可喜进展，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各级政府对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有了更多的经验；

——治理整顿已经取得明显成效，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宏观经济环境得到改善；

——中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

——中国政局是稳定的，社会是安定的；

——国际和平环境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王梦奎强调，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特别是同亚太地区的经济交往，有着广阔的前景；一个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中国，不仅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符合亚太地区和全世界人民利益的，这是我们讨论亚太地区技术与经济合作所应有的眼光。

王梦奎的发言，博得了经济专家们的阵阵掌声，他们称他是中国经济改革最有权威的“发言人”。许多经济学家在会后都私下与王梦奎切磋，认为中国的许多经济经验值得亚太其他国家借鉴和推广。

王梦奎在国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不少国家特邀他访问考察。

1990年8月20日，被提升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梦奎应苏联保卫和科学委员会的邀请，率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和裁军协会积极分子一行七人访问苏联。

王梦奎此次苏联之行，尽管是以和平使者的身份，但他并没忘记对苏联经济的考察。

在访问中，他发现苏联的国家机构都处于瘫痪状态，这令他

十分忧心。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三个人公开对他说，苏联可能会发生军事政变。他看到苏联人的思想十分混乱，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否定一切，向往西方，甚至把日本、法国、瑞典都看作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位研究经济的工作人员羡慕地对王梦奎说，中国的经济形势好，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提高得很快，中国改革的经验是值得苏联借鉴的，可我们的领导人总是不清醒啊！

在王梦奎接触的人中，没有人正面提到戈尔巴乔夫。有人说，一年前不是这样，现在他已经成了没有国土的国王。陪同王梦奎的苏联专家还告诉他现在流行的有关戈尔巴乔夫的两则笑话：

有一天戈尔巴乔夫到浴池洗澡，所有的人都急忙用浴巾把身体捂起来。戈尔巴乔夫很惊讶，问：“这是为什么呀？”大家说：“你每天带夫人到处走，今天不是带夫人来了吧？”

还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到一家工厂演说。工人们问：总统先生，您是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戈尔巴乔夫说：当然是社会科学家。工人说：怪不得呢，如果您是自然科学家，您这一套就应该先在老鼠身上作试验，不应该在我们身上作试验。

王梦奎回国后，提醒人们，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道路上一一定要接受苏联的教训，稳定第一，使经济改革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进。

## 国务院首席智囊的“西部经”

1995年，王梦奎升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着手研究

中国发展大略。这时候，西部开发问题便作为重点课题提到议事日程。王梦奎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之点不在东部，而在西部；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中国现代化的落脚点最终可能也是在西部地区，因此，开发西部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是长期的战略任务。

他说，我国是疆域广袤的发展中大国，各地由于经济发展条件和基础存在重大差异，实现现代化的难易和迟速也有不同。建国以来地区政策几经变化，但总的趋势，地区之间的差距是扩大的。根据预测，近期仍是继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实现现代化，应该包括西部广大地区。中国现代化的落脚点，最终可能也是在西部地区。我们的目标，是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既然那个时候还只是“基本”，就意味着可能有一部分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还会再滞后一些，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整个 21 世纪，都应该注重西部的开发问题。需要加大对西部地区发展政策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西部地区发展的优势和增长的潜力，促进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现代化进程开始不久，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还没有完成，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又有很大差别，如何在总体上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条件下，我国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会大体经历什么样的阶段，同其他国家相比会有些什么样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王梦奎认为，这些问题不是靠现成的书本结论能够完全回答的，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研究。一是中国国情和外国不同，二是国际经济环境和技术背景也和过去不同了。因此，要借鉴外国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地照搬外国书本中的现成结论来套中国，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问题必须要考虑的，也是研究西部开发